

试评郑振铎俗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万
建
中

内容提要 本文详细评述了郑振铎先生对俗文学的开拓性研究,以及他对俗文学的界定、对俗文学研究方法的探寻、实践等方面的成就,指出郑先生在这门学科中所处的历史地位。由于历史的局限,郑先生的研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没有把俗文学从民间文学中分离出来,影响了俗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价值。文章最后揭示了当代俗文学的内涵及发展走向。

关键词 俗文学 民间文学 正统文学 集体性 口头性 变异性

作者简介 1961 年 5 月出生,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根本任务是破除旧文学,开创新文学。如何建立新文学,其途径不外两方面:一是向西方学习,一是把不登大雅之堂的而又为广大平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奉至正统文学的地位,向这类文学吸取营养并为其正名。于是大量搜集民间作品,在创作中有意模仿民间文学,就成为二三十年代强大的文艺思潮。正是在这一文学背景中,“俗文学”的概念应运而生了。1938 年上海书店出版了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正式建立了中国“俗文学”学科。

“俗文学”学科的建立,是文学运动发展规律的产物。随着民众意识的觉醒,庙堂文学独霸文坛的“专制”状况必然首先会受到冲击。民众需要自己的文学,那些受到五四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目光自然便投向于平民文学,平民文学或类似于平民文学的文学纷纷变成铅字,出现于报刊杂志,为整个社会群体所认可。然而,要展示俗文学的实力,必须要有一部俗文学史,郑振铎先生主动承担并完成了这一任务。《中国俗文学史》的诞生,标志着俗文学对庙堂文学的漫长斗

争取得了划时代的决定性胜利。这部上下两册的巨著,是当时任何一部正统文学史无法匹敌的。无怪乎郑先生无比自豪地说:“‘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心”。^①

郑振铎先生之所以能将俗文学展示得如此宏阔,一方面,是与他他对俗文学的酷爱和正确认识分不开的。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序言中说:“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般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么?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笔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这种对俗文学优越性的认识极为深刻,道出了两种不同性质文学的实质区别。另一方面,也与他他对俗文学的深入发掘分不开。郑先生是现代文坛最早全面搜集、整理俗文学的人之一。诸如佛曲、弹词及鼓词之类,一直未引起文人的注意,郑先生首先将其纳入俗文学,并予以高度评价。他在《西谛所藏弹词目

收稿日期:1993-12-25

录》一文开头说：“为弹词作目录，恐将以此为第一次。弹词的重要，决不下于小说与戏曲，其中几部著名的作品也可与小说戏曲中之最好者相提并举。”郑先生对俗文学许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开拓性意义。

通过对中国文学发展史全面系统的考察，郑振铎先生认识到作家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无一例外都来源于民间文学。就小说而言，“它一开头就不是由几个有才能的文人创作出来的，而是从民间来的，是口头流传的，它最早是群众文娱活动的一种”；^②如今精致的戏曲也是从“民间粗野的戏曲”演变来的；^③诗歌更是如此，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两大起点的《诗经》和《楚辞》，前者“采用长江以北的人民的歌谣”，后者则“运用了楚国人民口头歌唱的形式”。^④一般以为“词”属文人的创造，郑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词就是诗的一种体裁”，是必须按谱（曲）填写的，而词曲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民间歌谣如刘禹锡、白居易的《杨柳枝》、《竹枝词》”。^⑤关于这一点，郑先生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象《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象五言诗原来就是从民间发生的。象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那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⑥俗文学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向作家文学灌输着新的血液。若没有俗文学的滋润，中国作家文学就不可能取得辉煌成就。这一点，郑先生看得非常清楚，他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按指作家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⑦

郑振铎先生在俗文学领域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以俗文学的“实力”为其在整个文坛争取了一席之地，还在于他对俗文学内部因素的认识。他说：“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⑧郑先生在30年代初期就已看准了俗文学与其他文学的根本区别，抓住了俗文学最为本质的特征，这就是俗文学是切合民间生活的，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劳动生活紧密相连。在后来的《中国俗文学史》中，郑先生又把“大众的”视为俗文学的第一大特征。他说：“俗文学是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她是民众所嗜好的，所喜悦的；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故亦谓之平民文学。其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的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议论国制朝章，她所讲的是民间的英雄，是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是民众所喜听的故事，是民间的大多数人的心情所寄托的。”^⑨这种对俗文学内容方面特征的理解，即使是在现在看来，也是极为精确而深刻的。

郑振铎先生还致力于俗文学本体论研究，对俗文学的外部特征有精辟论述，表明他对俗文学的范围已有了清晰的界定。在《中国俗文学史》的第一章，他说：俗文学“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我们不知道其作家是什么人。他们是从这一个人传到那一个人；从这一个地方传到那一个地方。有的人加进了一点，有的人润改了一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其真正的创作者与其正确的产生的年月的。也许是流传得很久了；也许是已经过了无数人的传述与修改了。到了学士大夫们注意到她的时候，大约已经必是流布得很广了。”在这里，郑先生阐明了俗文学创作方式上的集体性及匿名性特征，肯定了俗文学由集体创作，集体流传，为集体服务并为广大人民所共有，广大民众既是俗文学的作者，又是传播者和享受者。紧接着，郑先生又说：俗文学“是口传的。”“她从这个人的口里传到那个人的口里，她不被写了下来。所以，她是流动性的；随时可以被修正，被改样。”这段文字道明了俗文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口头性和变异性。关于变异性，郑先生在另一处也有说明：“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俗文学）便也时时刻刻的在进展着。他们的形式，便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着，永远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后永久固定的定型。而民众的生活又

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这种文学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郑先生的这些观点与现今我们对民间文学特征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在30年代,还没有哪位作家和学者对俗文学的特征阐述得如此系统、明确和有深度。无疑,现今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和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上,郑振铎先生应占有重要的一章。

在五四时代,当其他学者正努力搜寻俗文学材料的时候,郑振铎先生已注意到研究俗文学的方法问题。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他把方法比作农民种田用的“镰刀与犁耙”,强调地说:“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如果没有镰刀与犁耙,那便无从着手”。他提出研究要走新途径,必须走两段路,即“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归纳的考察”的条件是有足够的材料依据,“等到证据或材料归纳得有一个结果了,于是他的定论才可靠成立,他的研究才可告终结。”^⑩郑先生潜心《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除了要向世人展示中国俗文学的久远和丰厚外,大概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向大家提供研究的依据,为“归纳”提供前提。“归纳的考察”方法至今仍有有用武之地,还有许多俗文学资料必需去发掘,已发现的需我们去整理,去作“史”的探索。任何一门学科要能立得住,就必需有自己的历史。“进化的观念”是指文学现象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它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基于这一种认识,郑先生往往采用类比和溯源的研究手法,探寻某些具体的俗文学作品的演进轨迹及同类故事间的互相影响。郑先生在1932年写了一篇极有趣味的论文《蝴蝶文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包含有灵魂化蝶情节的许多中日民间故事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中日民间普遍的蝴蝶为魂所化的思维定势和蝶与灵魂崇拜的密切关系。1929年郑先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老虎婆婆》一文,他说:“《小红冠》式的猛兽,变了人——常常是老太婆——去吃小孩子的故事,是世界各处都有存在着的。中国式的《小红冠》故事,与欧洲式的《小红冠》故事其间区别得很少。不过欧洲式带些后来附加上去的教训意味,中国式则无之,而欧洲式的小孩子为一人,中国式的小孩子常为二人而已。”作者不仅比较中外“狼外婆”故事的异同,还稍稍梳理了此式故事的演变脉络。郑先生的这类论文,开创了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法的先河,也为“AT”分类法的产生提供了具体依据。在《孟姜女》一文中,郑先生通过考察万喜良姓名的来历,总结了民间传说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他说:“如果我们肯费了一番工夫,去搜寻各地的民间传说,一定更可以得到无数的由古书中所叙的短故事蜕化出来的传说。(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很有趣味的,不知各地有人高兴去做否?)由此可知,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固然常被文人采取而写在纸上,却同时也有许多书籍上的故事,被民间所流传,辗转重述,而成为传说的一部分。”^⑪可惜我们现在很少有人继续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郑先生还曾对著名的中山狼故事的变异过程进行过考察,为了昭示这一故事“因了地方之不同,而他们是如何的变异”,他还将所知各地流传的这个故事的大要,列了一张表。这种图解的研究手段在当时还很少有人使用。这篇文章的最后,郑先生欣喜地说“把中国各地传说依同样的方法去研究其根源与变异,那不是一件很伟大很有趣的工作么?”^⑫他的“进化的观念”在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中获得具体显现。

1927年郑振铎曾编集了一部论文集《中国文学研究》,其中的论文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俗文学的。如朱湘的《古代的民歌》,刘经庵的《中国民众文艺之斑——歌谣》,汪馥泉的《民歌研究的片面》,赭东效的《中国儿歌的研究》,徐傅霖的《中国民众文艺之一斑——滩簧》,钟敬文的《中国蛋民文学一瞥》等,郑先生自己的论文绝大多数也是对俗文学的微观阐释。可见,郑先生

在写《中国俗文学史》之前,就有意识地在倡导和组织对俗文学的研究,试图建立一个俗文学的理论体系。

郑先生对俗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三十年代,由于时代的局限,其俗文学的理论难免有不足之处。当时文坛,俗文学,平民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及“野草”文学等等之间并无明确界定,混为一谈。郑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不可能超越时代而把俗文学从民间文学中分离出来;加上出于政治的需要,这类文学被当作反抗正统文学的工具,为壮大其声势,人们也无意去辨识它们之间的微妙区别。正如郑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说的:“中国的‘俗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了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郑先生从文体上把“俗文学”分成五大类:1、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等);2、小说(指“话本”,即用白话写成的小说);3、戏曲(戏文、杂剧、地方戏);4、讲唱文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说唱文学,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5、游戏文章。

按现在的观点,这一框定显然太宽泛,把俗文学和通俗文学等同起来了,甚至于认为士大夫阶级、上层贵族创作的带有民歌风味和以白话写成的志怪、志人小说及游戏文章也包括在内。这样尽管壮大了“俗文学”的队伍,但也给研究带来困难。郑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对俗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民间的文学,也就是的大众的文学”。只要是通俗的,下里巴人的,皆可纳入俗文学,故而郑先生将神话排除于俗文学领域之外。单凭“通俗”来确定一个学科的内容和范围是不够的,况且“通俗”本来是一个软性指标。譬如神话,在滋生神话的原始时代必然是通俗的,现在却艰涩难解。再如地方戏,其通俗性也只能就地域而言。

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明确或比较明确的范围,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也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这就是通俗文学学科研究一直停滞不前的原因。事实上,“俗文学”这一概念并未获得普遍接受和运用,郑振铎自己在以后的文章中也很少提及。相反,由于“民间文学”这一名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其内涵及外延愈来愈明确,民间文学便淹没了俗文学的地位,成为大众文学中的一门独放异彩的学科。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83年全国俗文学学会成立后,俗文学研究工作有了一定进展。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俗文学从属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学的一个分支,这实际是在重蹈郑振铎等前辈的覆辙,取消俗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价值。半个多世纪前,郑先生受着当时社会条件和学术状况的种种限制,尤其是民间文学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他只能给俗文学下一个广义的定义。毋庸讳言,我们现在对俗文学、民间文学及通俗文学的界定也是不明晰的,这说明它们之间确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毕竟现在学科设置越来越趋于精密,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早已确立。俗文学应是与其并存的一个学科。事实上,在与正统文学并立的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中,除了那些集体创作并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外,还有许多是作家创作或改编的书面文学。如明清时代的《三言》《二拍》《挂枝儿》《山歌》《聊斋弹词》等等。这类通俗易懂,主要供广大百姓消遣的文学,就应属俗文学。《今古传奇》《传奇故事》《章回小说》《通俗小说选》等刊物登载的作品即为此类。除小说以外,还包括各地民间的演唱形式,通俗歌曲及相声、小品的脚本等等。

要确立俗文学的学科地位,就要划清它与民间文学的界线。首先,民间文学所包蕴的文化内涵往往是传统的,其内容情节有较大的稳定性,即便有变异,“主杆”依然如故;而俗文学更多

的与社会思潮、民众心理密切有关,因此,俗文学表现的内容往往更现实些。我们开展对俗文学探讨研究的意义,也主要体现于能揭示改革开放浪潮中,民众普遍的思想活动,心态及观念之嬗变和弘扬民族文化等这些方面。这也符合郑振铎先生所谓的“进化的观念”。

其次,这两种文学流传的地域不同,前者主要兴行于乡村,乡村是我国民间文学产生和传播的最大市场,民间文学是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各省编集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就来自乡村。后者则主要遍布于城镇,在广大市民中流传。俗文学之“俗”,除了其有通俗意外,还含世俗、俗气之义;俗气者,小市民也。故而俗文学的绝大部分读者是市民阶层。他们与“土”文学——民间文学的读者群构成了我国最大的文学创作与接受群体。

一般说来,城市较之乡村,更易接受新事物。各个城市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一,有的在内地,有的在沿海,有的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有的为经济中心,有的以古都著称,有的以商业发达闻名,如此等等,这就使得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一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不同的城市因其环境(自然的、人文的)差异,导致其居民观念、心态、生活习惯、风俗等等的不同,这些都会在俗文学中表现出来。另外,城市居民的文化素养较之乡村农民普遍要高,因此他们的审美趣味就超出了“土”的层次,已不是纯粹“下里巴人”的了。

我们对俗文学的研究,从郑振铎先生到现在,中间有一大的断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俗文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无人敢问津。文艺理论工作者只视民间文艺是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而视俗文学于不顾。迄今为止,中国俗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除郑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及四十年代杨荫深《中国俗文学概论》外,几乎是空白。然而,没有研究或缺少研究并不等于俗文学就没有发展。俗文学自身的生产一直没有中止。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在商品经济的冲撞下,俗文学的生产更为兴旺。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对古代、近代俗文学的研究整理,对现当代俗文学的研究也应成为一个主要任务。相对民间文学而言,俗文学更贴近时代脉搏,变化更频繁,也更易失传,这给搜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既然郑振铎先生为我们开创了这门学科,给我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作了许多具体示范,那么,我们就有信心弘扬我们的俗文学事业。

(责任编辑 吴直雄)

注:

①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2页。

②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载《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28页。

③郑振铎:《接收遗产与戏曲改进工作》,载《光明日报》1950年11月27日。

④《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载《光明日报》1953年6月15日。

⑤见《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260页。

⑦⑧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页。

⑨《中国俗文学史》,第4页。

⑩见《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书店印行,第6页。

⑪见《文学旬刊》第137期(1924年9月1日)。

⑫见《中山狼故事之变异》一文,载《中国文学研究》。